

新观察

注入理想的神髓,文学才有希望

□张柠

“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这里的“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两个短语,是并置在一起的。如果两个短语同义,那么并置在一起就是同义反复。这是两个有差异的短语。我想,这个议题在设定者的心目中,应该是有矛盾的、有疑问的、有歧义的。也就是说,“理想性”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有矛盾、有疑问、有歧义?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要首先表明我的态度。我的意思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不管它写什么或者如何写,都必须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理想性的,浪漫主义也是理想性的,甚至现代主义文学,也必须是理想性的。我把“理想”作为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如果没有这个公约数,没有这个共同的特征,它就很难说是我们所实践的、研究的“文学”这个范畴,它就可能不在我们所说的“纯文学”的范畴之内。那么,它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你可以将它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别,单独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去研究它。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学”“Literature”,它就是“理想性”的,或者说他就是具有“理想性”的一种文类或文体。如果不是,我们就可以说,它的“文学性”是有疑问的。肯定有人问,既然都是理想的,那你刚才列举了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我是说,“理想”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但他们的表现形态不一样。

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都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但是,它们的“理想”形态有差别。我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来描述:现实主义的理想是地上的理想,浪漫主义的理想是天上的理想,现代主义的理想是梦中的理想。地上的理想,是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的,是牛顿力学世界的理想。天上的理想,是逃离地球引力的,是试图超越牛顿力学限制的飞翔的理想。梦中的理想,是非理性的,是对自由极度向往而产生的变异形态。前面两种文学类型,它的社会性色彩更强一些。后一种类型的文学,个人主义色彩更浓一些。前两种文学类型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实证主义的和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学和分类学的。后一种文学类型,它的研究方法,必须首先经过“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现代理论的分析,然后才能进入实证和逻辑分析分析。但不管他们的差异如何,他们都具有“理想性”这个公约数。

当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理想形态。比如说“前二十七年”的文学,其理想形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想主义,地上的理想和天上的理想,或重叠,或交叉,或融合,或冲突。浪漫主义理想要把人从大地上推到天上去,革命的现实主义把天上的幻想拉到地面上来,两种理想形态,有时候也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撕裂感。又比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同时开辟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现实主义或者叫批判现实主义的路子,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发展到今天。第二条路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这两条路是齐头并进,脉络清晰的。在今天依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再重复一遍,“理想”是文学之魂,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的心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充分肯定这个判断,并且越来越认可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古老的信念,就是理想在文学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上面是我所说的第一层意思。下面我要说第二个意思,就是理想的文学的写作问题。

文学创作怎么表达上面所说的“理想”?其方法是复杂而多样的,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方法。我要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谈内容,第二个例子谈形式。

先说内容。内容同样是名目繁多的。我举“传奇性”和“日常性”这一对举的概念来说明。我们的文学到底要书写什么内容?是书写“传奇性”还是“日常性”?这是现代以来的文学的一个基本选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很多人喜欢读传奇性的作品,这是通俗文学或者类型文学具有广阔市场的原因。在所谓的严肃文学中,也有不少人喜欢写传奇性的作家。比如《白鹿原》的开头就是一个“传奇”: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前面六房都离奇死亡,有的好像还跟一个什么“白鹿”有关,很传奇,很刺激。

这种“传奇性”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为什么要提

“理想”是文学之魂,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人类古老的信念,就是理想在文学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

文学向人类传递的,是人们的尊严和信念。作家写的不是实然世界,是应然世界,但是材料是实然世界里面的,这种材料是杂乱无章的,但它结构在一起应该是“美”的。

“日常性”?我认为,现代文化或者叫人文主义的文化,其基本起点就是关注个人生活的日常性。现代文学的特征,就是把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书写对象,使日常性产生美学价值。这是人类文学史的一个重大节点,它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审美呈现形态。它把日常生活本身作为美学书写的对象,将个人经验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出来,而不是否定它、质疑它、排斥它。由此,文学艺术才开始了它的现代之旅。18世纪的英国文学里面,简·奥斯汀就是把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书写的典范,简·奥斯汀至今仍仍在世界文学的阅读畅销榜上经久不衰,就因为她写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如此,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

那么,传奇性的本质是什么?传奇性是对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逃离,用一种“陌生性”的、骇人听闻的传奇性,来否定熟悉的日常性。日常性是我们熟悉的,同时具有不确定性。传奇性是我们陌生的,同时也是确定的。因此,对传奇性的迷恋,实际上是对确定性的迷恋;对日常性的疏离,其实也是对不确定性的逃避。只有现代美学才能够处理日常性和不确定性,古典美学最擅长的恰恰是传奇性和确定性,而真正敢于面对当下日常生活的人是勇者。

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那个“主义”,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基调。我们强调的日常性及其人文性,是以科学理性为背景的日常生活,它的出现就是因为它具有人文性。但它是不是具有文学性呢?这是一个疑问。文学创作的重要功能,就是要具有人文性的事物转化为具有人文性的细节和情节和结构,转化为具有象征性的美学系统。将世界变革当中的一个具有人文性的事件和情感,转化为文学性,转化为审美经验和一项系统,是文学家的重要功能。世界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科学技术在不断更新换代。它给人类带来了福祉,这是人文主义的胜利,但它一定具有文学性吗?它成为诗歌意象系统里的成员了吗?它成为形象史中的一员了吗?它是人类精神史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形吗?这都是疑问。因此,文学家的重要功能就是把日常经验转化为审美经验,把人文性转化为文学性。这就是我所说的日常性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日常生活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普通人,这是五四的一个重大变革,从鲁迅先生开始。鲁迅先生对日常性写得不够充分,他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变态的,变态的人格,都是寓言式的写作,目的不是呈现日常生活,而是否定此前的日常生活,呼唤新的日常生活。

第二个例子是讲形式,狭义的形式。“形式”当然也是名目繁多的。在谈形式问题的时候,我打算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叙述视角的问题,也就是作家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视野,是用限制视角,还是用全知视角?

比如,我们写一个小说,长篇的、中短篇的,我们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来讲述或者呈现眼前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能用“限制视角”,而不能用那种古典文学中的“全知视角”,因为那是“上帝视角”,不是“人的视角”。如果今天还有作家这样写:“他心里

想,有人就会批评说:“你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蛔虫,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如果作家这样写:“他们两个躺在床上,议论着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心里充满疑惑。”有人就会质问:“人家两个人在房间里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去听房了啊?”

我认为这是一种谬误。文学作品写的不是“实然世界”,它并不一定要写“确实如此”的世界,它写的是“应然世界”,写的是“理应如此的世界”。比如我说“明天太阳将要升起”,你说:“你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太阳明天将要升起?”因为明天的太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升起来,世界依然如斯;一种是不升起来,地球爆炸了。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太阳是否升起。可是我不但要说“明天太阳将要升起”,我甚至还要说:“明天太阳必将升起。”这是信念,如果连这种信念都没有,我们还活着干什么?大家都去死吧。

因此,文学向人类传递的,是人们的尊严和信念,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明天太阳升起来。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如此,应该是理想的,有信念的。爱情描写也是如此,你的心里在想,我很爱他(她),连这种信念都没有,你怎么写小说,你当什么作家?因为作家写的就是“应然的世界”,“理应如此的世界”。这也是伟大的托尔斯泰的观点。

年轻人肯定在说:“老东西,你就只知道托尔斯泰,真老土。你知道萨德吗?知道夏多布里昂吗?知道卡夫卡吗?知道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吗?”对,我必须重读重提托尔斯泰。我们都是从现代主义文学、卡夫卡、博尔赫斯那里走过来的。但我现在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说,一个作家要具备两种能力:第一,他有判断什么事情应该有能力的。第二个,他有坚信什么事情应该有能力的。前面那个叫“应然世界”,后面则是对“应然世界”的信念。一点信念都没有,不能确定世界应该怎么样,人性应该怎么样,如果没有这样的确信,没有对应然世界的信念,为什么要写作?写作难道仅仅是无聊的饶舌吗?作家写的不是实然世界,是应然世界,但是材料是实然世界里面的,这种材料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是龌龊的,但它结构在一起应该是“美”的。

所以,作家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中,在光明和黑暗中,在许多多实然世界的材料中,在词语、物象、细节、情节中,注入理想的神髓,文学才有希望,人性才有希望。

(本文系作者2019年6月29日在长沙“新中国文学70年”论坛上的发言)



□韩少功

「自我学」与「人民学」

■关注

回望历史,在19世纪那些作家们笔下,冒险家(杰克·伦敦)、暴发户(巴尔扎克)、灰姑娘(夏洛蒂·勃朗特)、凤凰男(汤达)、心机婊(福楼拜)的生动形象令人难忘。作家们鲜活、敏锐、广博地表现着俗世人间,富有烟火气,不避重口味,实现了认知的一时并喷。从总体上说,这一过程将文学从《荷马史诗》《山海经》的神学状态,从宫廷传奇那种“神怪+王侯”的准神学状态,最终推向了Humanism,即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间主义,或者说“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

不过,当时流行的人性论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现代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分化。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都市,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和“无意识”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导和呼应。尽管弗洛伊德因临床数据造假,后来在心理学界光环不再,但阴差阳错,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夫、卡夫卡等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投入了非理性、反社会的“原子化”和“向内转”,在作品中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他人即地狱”,萨特的这一名言,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鼓舞了多少人进入一种高冷自闭或玩世放浪。他们不一定引来市场大众的欢呼,却一直是院校精英们的标配谈资,构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斯安那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新词,阐明了有关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汲取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文坛旗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影响大半个地球的“红色三十年代”。这一幕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体系的底部和外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难理解,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作为穷国和穷人的尖锐现实,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已有阶级理论呼之欲出。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斥责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诱惑”,也与早期人道主义拉开了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到列宁怀疑为过了头)。若比较一下后来东、西方的经典书目即可发现,哪怕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不要说高尔基和鲁迅了,都因社会性强,下层平民立场彰显,通常就会在西方院校那里受到无视和差评。这与它们在东方广受推崇,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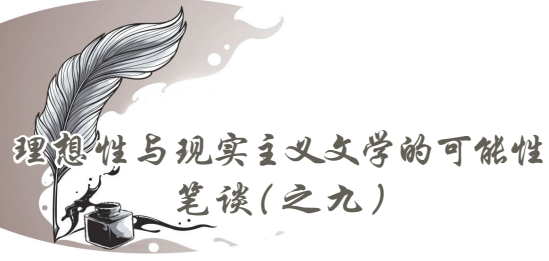
“人民学”和“自我学”,大概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

其实,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没有高纯度且一直充满争议,在传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误读。在正常情况下,“自我”与“人民”,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人”的认知和审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生活催生一种文字,释放了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这也是“人学”的一体两面: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联感同身受的“大我”关切;同样道理,真正伟大的人民,也必由一个个体、自由、强健、活泼、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所组成。可惜的是,历史实践总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有些人学偏和做坏,包括出现教条化、极端化、投机化的自我挖坑。当年鲁迅批判过“留声机器”和“招牌”式的高调“革命文学”,“文革”时期也出现过“造神”化的某些文艺宣传,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和“高级黑”,“人民”的形象在文学中屡遭扭曲,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在另一方面,非理性、反社会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其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其幽闭或放浪的风格,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兰·巴特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都让后来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种高发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这些词,不知何时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已是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所向,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

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人民”与“自我”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扑来,多种视角该如何彼此包容和多元统一,重新融铸成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天赋异禀?当人的很大一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众多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共生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不是什么人成天照镜子可以照出来的。

换句话说,“人民”与“自我”,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水。

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那么,在认知“人”的漫漫长途上,随着科学理论的刷新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文学的21世纪该是一个什么新模样,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还需写作者进一步观察和体会,进一步努力干活。



广告

中篇小说 马乙的阴谋 王松
龙头香 杨晓升
伊戈尔位置 袁亚鸣

短篇小说 凡人俗事 聂鑫森
彩娥 李宏
此情无路 刘春雨

纪念《长城》创刊40周年
记忆《长城》... 张峻 郁葱 李克灵
我与《长城》(以作者姓氏笔画为序)
王松 王春林 王祥夫 申跃中 关仁山 李洁非
吴克敬 何玉茹 张清华 张新颖 胡学文 谈歌

文学品质 一些闲话,关于诗 乔叶
文情关注 社会关切与人类心灵奥秘的破译 王春林
短篇的艺术 “我听到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 张学昕

当代文学中的“潜叙事”
当代文学中“兄弟相残”原型叙事探究 ... 张清华等

生命追寻 一生梦断,烟霞山月 齐红
文事新说 胡适的诗文翻译译绩 杨建民

邮发代号:18-66。地址: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邮编:050021。电话:0311-85803609。邮箱:changcheng79@126.com。

来自鲁迅故乡的文学期刊——
野草 2019年第4期要目

中篇小说 “死险”朱四 左马右各
房顶上 禹凤
春天的拱门 羊父
孔雀记 黄金明

短篇小说 溯源开屏(外一题) 沙叶
暗示 钱墨痕
渔网与姑娘 丁东亚
渔网与姑娘 许冬林
春天的活页 傅雪成
和猪一起生活的日子 宣迪森

诗歌 在北方钓鲑鱼(组诗) 横行胭脂
山穷水尽,路转峰回(诗译) 王士强

小小说 追魂记 商略

散文 留下仅有的怀念,却无比空旷
——纪念诗人方向 邵汉明

诗歌 写作是很个人化的事情,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给我定位
刘心武 傅小平

沉默或低语 刘心武 傅小平

印痕 何国门篆刻 何国门

邮发代号:32-97 国内统一刊号:CN33-103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1260 双月刊 全年价:60元
主管主办:绍兴市文联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312000
电话:0575-85136031
投稿邮箱:yezq1980@163.com peter-707@126.com
yecaozazi@163.com

作家立场 “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讨论辑
全球语境内的性别化谚语智慧
米尼克·斯希珀著 夏露译 贺桂梅
性、性别与文学创作中的观念自觉 贺桂梅
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 梁鸿
一个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到来 张莉
复活的暗黑大地 秦曙光
卡瓦菲斯:城市作为世界 黄灿灿
禾木河源 康剑

诗歌
诗歌精选2019:戴 隼 江 非 沈 苇
陈三九 张执浩 阿信 胡亮 李寂荡等
小说 张琼与埃玛·宗兹 戴冰
蛤蚧候风雨 崔君
清明目 梁蒙
散文 小白传 崔曼莉
回梁河 刘芥
渔民阿龙 草村

艺术 宋庄访谈录 施玮 李广明 胡介报
方力钧 岳敏君

研究与批评 “易读鲁迅”专栏之三:二十年谈话《风琴》
..... 郁元宝

《天涯》杂志官方微信信号(tyzz1996),可一键下单,订阅杂志,亦可到邮局订阅或与本刊联系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20.00元/期,全年6期120.00元。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0004 65332803。

开卷 众鸟高飞(组诗) 刘立云
我看见(组诗) 马永波

诗潮 爱(组诗) 于之雅
扬州十年(组诗) 张作梗
大概(组诗) 刘汀
站着(组诗) 车延高

新星座 谈 晓 刘 梦 卢 山
伯兹桥 喻诗

随笔 演讲与随笔 吉狄马加
成为一体的时间(四篇)
——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
【亚美尼亚】加吉克·达夫特扬等

诗人研究 智、力、情的互动共生——论叶廷滨新世纪的诗歌创作 罗振亚 许仁浩

地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社
邮编:210019 电话:025-86486051
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订阅:1、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28-270;2、直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全年90.00元)。单月5日出版。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9-542X。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2-1787/I。定价:15.00元。